



从《梦华录》三处细节,看北宋商业文明

近来热播的古装剧《梦华录》以茶坊主赵盼儿、厨娘孙三娘和琵琶手宋引章在北宋都城开封的创业故事为主线剧情,在讲述茶坊经营的酸甜苦辣的同时,剧集用大量镜头语言和次要情节呈现了开封等城市中市井味道浓郁的商贸环境和生活图景,还运用《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描摹,直观地还原了北宋商业文明中一些代表性特征。



这是如今的开封御河夜景。 新华社发

□王申

充足的城市粮食和副食供应

《梦华录》中女主角们在后厨中制作新鲜糕点的场景颇为亮眼。独具特色的可口食物正是茶坊成功经营的“法宝”。由于没有冰箱,食物保鲜对宋人而言是颇为头疼的难题。居家用盐腌渍自然是解决的办法之一,而前提则是开封城拥有充足的粮食、副食供应。

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人口百万的特大城市。城市居民大多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购买生活物资,如何解决吃的问题是体现城市物资供应能力的关键。对于北宋开封而言,粮食和副食的供应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来自东南地区的漕粮,每年可以为开封带来约六百万石的粮食,基本满足了官廷、官僚机构和驻军的需求。二是来自周边地带的供应。大量的粮食和副食有赖于开封近郊、辖县和周边州县的供应,共同支撑起了都城居民庞大的饮食消费。开封城中的肉店、粮店和各类酒楼茶肆颇多,销售食品的贩夫走卒更是不计其数。以鱼类供应为例,每日清早鱼贩从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入城销售,数量多达数千檐,即便在冬天,也有商贩采购外地鱼前来销售。

最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城郊农业的转型。由于主食供应较为充足,加之副食利润较高,开封城郊农业在北宋中期经历了从种植粮食为主,到种植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变化,这显然是顺应了城市居民更为高级的消费需求。副食交易的利润之高,以至于有城郊农民将自己的田地戏称为“青铜海”。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粮食、副食供应也比较充足,宋代因此成为城市迅速发展的时代。

丰富的街市贸易与“夜生活”

在剧中呈现的开封街景中,各类大小商铺和走街串巷的商贩随处可见,营业时间甚至延到深夜。随着宋代商业的发展,开封等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快速成长为经济中心和贸易节点,其经济意义不亚于政治、军事意义。经济意义的抬升对于城市形态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以都城为例,唐代长安是一座官方规划建造的古典城市,商业批发活动只能在专门的“市”内。居民生活区“坊”不仅和商业区“市”分离,还用坊墙区隔起来。坊门昼启夜闭,坊内大约只有一些“小卖部”。宋代开封则打破了坊市之分,商业店铺与民宅混杂

而设,一层经营、二层居人的民宅也很常见。至于店铺的经营项目,可谓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等宋代文献和画作直观地展现了开封城中各行各业的经营状况。

在经营活动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商人将店铺延伸至街面,宽阔的街道越变越窄,这是宋代著名的“侵街”现象。宋廷曾拆毁这些“违建”,并在部分重要地带设置标志,但逐渐又被商人“占领”,最终只得向侵街店铺征税的形式妥协。因此,剧中呈现的街道恐怕还是过于宽敞了。宋代都市商业经营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开封出现了繁荣的夜市经济,大小店铺往往营业至三更才打烊,五更又开张。繁荣的“夜经济”拉长了人们的活动时间,刺激了居民的消费欲望。

繁荣的海外贸易

剧中涉及的第一个大案,便是钱塘县令等官员利用走私贸易牟利,每年获得的赃款可达二十万贯之巨。宋代是一个海洋文明和海外贸易高度发达的时代。宋代海外贸易的一大特点是,绝大多数贸易行为由民间实施,官方鼓励民众从事贸易活动,仅通过市舶机构处理货物税收、出入境管理、违禁品查验等行政事务,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官方对外贸易行为。在这样较为开放的政策下,浙、闽、粤等沿海地区的人民以出海贸易为生者甚多,明州(今宁波)、泉州、广州等国际性大港逐渐形成。

宋代商人和水手的足迹遍布东亚、东南亚等地,在南洋地区与来自阿拉伯、欧洲的商人展开了充分的贸易交换。这些贸易活动丰富了中外经济联系,促进了世界市场中的物资、人员流动,也使宋钱在东亚、东南亚等地获得了相当高的流通地位。沉没于广东省附近海域的“南海I号”大型宋代商船,出水文物多达18万件,包括大量精美的外销瓷器、漆木器、铅锡器,充分展示了宋代外销货物的体量和多样性。

繁荣的海外贸易,一方面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笔丰厚的额外税收。据学者统计,南宋前期国家财政每年从海外贸易中取得的收入约200万贯,对改善沿海地区的财政状况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从沿海到内陆的海外商品贸易网络得以建立。来自海外的香药、饰品和其他商品不仅仅用于官廷奢侈消费,还广泛地见于民间市场,有些甚至成了风靡一时、颇受追捧的“网红产品”。海外商品不再高高在上,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据新华社

□贾珺

纵观中国园林史,发展至宋代,已经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庭院的内容形式也趋于稳定,这一点在近日热播的古装剧《梦华录》中也得以充分体现。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有一句台词脍炙人口:“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宋朝人应该对这句话最有共鸣——因为他们的很多春天,都是在园林中度过的。

北宋时期,中国造园艺术的中心不是江南地区,而是位处中原的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

《东京梦华录》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范围之内找不到一块空闲寂静的地段,春天到来的时候,“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城内居民竞相出游,从城南到城北,皇家御苑、私家园林、佛寺园林、道观园林、官署园林和名胜风景区鳞次栉比,亭台楼榭、画桥流水美不胜收,令游者沉迷其中,乐而忘返。

宋代皇家园林的数量不及秦汉隋唐那样多,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景物的细致程度则明显超过前代,其中最精雅的是徽宗政和年间所营的艮岳。艮岳位于开封城东北部,三面均以人工叠造的大假山围合,中央辟两个方形水池,另有曲折的河流和小池蜿蜒其间,山上堆叠来自江南和其他地区的奇石,雄峻险怪,瑰丽灵秀,千姿百态。此外,大内后苑、延福宫、金明池、琼林苑、玉津园等也各有佳致。

每年三月上旬,金明池、琼林苑和玉津园都向广大市民开放,是官禁森严的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特例。皇帝与群臣在金明池水心殿大开筵席,水面上有龙舟比赛和彩船表演,东岸可以钓鱼,还在几座园林的空地上搭置临时帐幕,充斥各种演艺、杂耍、赌博以及饮食、古玩、百货,热闹至极。

西京洛阳本是前朝故都,宋代降为陪都,私家造园的风气比开封更盛,号称天下第一。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过一篇《洛阳名园记》,记述了洛阳最有名的十九处园林,其中包括开国宰相赵普的宅园,仁宗时期宰相富弼的宅园,名臣司马光的独乐园、节度使苗授之的宅园以及环溪、湖园等名园。这些园林一般建筑数量不多,假山以土山为主,常以水池为中心,更多以各种花卉以及松柏、竹林等植物景观见长。诸园虽然大多属于官僚阶层,却表现出强烈的文人气质,而且可以接待外来游客。

洛阳名园中最受人称道的是司马光的独乐园。这座园林以“独乐”为主题,设有读书堂、弄水轩、种竹斋、

热播剧里的宋朝园林,藏着古人多少春天的记忆?

见山台等七处景致,分别与主人仰慕的七位古代先贤一一对应,反映了深刻的哲理和通达的人生态度,被后世视为文臣园林的典范。另一座湖园以大面积的湖池为中心,水中堆大岛百花洲,湖北建四并堂,以示同时并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大优点。

洛阳的水土条件极好,非常宜于培植花木。春日百花齐放,以牡丹最为明艳,洛阳人对之异常珍爱,甚至以单独的“花”字作为牡丹的专称。三四月间,全城市民无论男女、老幼、贫富,都喜欢在头上簪一枝花,然后去逛各处园子。一般进入私家园林,需要给看门人一点“茶汤钱”——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公园门票。高官魏仁浦的宅园在池中小岛上秘密培育出牡丹名品“魏紫”,轻易不让人看见,游者交纳十几钱之后才能乘船前往观赏。独乐园的园丁名叫吕直,得了十几贯钱,不愿私吞,主动在园林增建了一座井亭。

文人更喜欢在园林中举办各种雅集,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活动尤其频繁,特别是立春、二月十二日花朝、三月初三上巳、清明这几天,往往要在园中赏花、宴饮、吟诗,兴致勃勃。我们熟悉的很多宋人诗词,都是春日游园时所作,比如“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洛阳相望尽文人,墙外花胜墙里看”。宋代最著名的文人雅集当数游国公文彦博留守洛阳时筹办的耆英会,邀请年高德劭的退休官员在各大名园轮流宴集,诸老大多年过七十,须发皆白,与艳丽娇美的牡丹花相互映衬,传为佳话。

靖康之变后,屡遭兵火的两京沦于残破,被金人所占,所有名园均成废墟。宋朝的疆域退缩到南方的半壁江山,临安(杭州)、平江(苏州)、吴兴(湖州)、扬州崛起为新一代园林名城,景致更趋于婉约秀美,对元明清三代的造园风尚影响深远。

南宋时期,春日游园的风俗依然延续。临安皇官由内司在后苑中主办赏花盛典,亭榭花木装点一新,锦帘销幕,器玩盆窠,珍禽异物四处陈列,还让小太监扮作伙计,开设店铺,售卖各种瓷器、玩具、首饰、龙船、饮食,只是不再与民同享。高官显宦各拥私园,热衷于在花丛中聚会畅饮。老百姓们主要以西湖、虎丘等兼具园林属性的名胜风景区为游览地,同样没有辜负大好春光。

再美好的春天,也终将逝去。时隔数百年,宋代园林的雅韵恍若一场春梦,早已随风而逝,却又凭借少量遗迹、名画和《东京梦华录》《如梦令》之类的文字,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其情景,令人无比神往。(本文作者为清华



明代仇英《独乐园图》中的读书堂。